

# 国际汉语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以教材话语修辞策略为例

耿直 \*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

高原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

## 摘要

国际汉语教育是中国话语构建及中国故事讲述的一个重要途径, 也承担着促进世界多元文化间理解与交流的重要功能。然而, 当前汉语教学在发展中也面临新的困境, 这与国际汉语教学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策略失当不无关系。文章以几部汉语教材为例, 分析了教材的话语策略失当问题, 并借鉴当代修辞学理论, 针对中国话语整体构建的“三贴近”、“三表达”和“五种能力”的顶层设计, 提出了汉语教材“三共”、“三可”的话语体系以及教材修辞的“三大诉求”、“六种认同”等九项修辞策略。本研究希望能够促进学界对国际汉语教育话语体系研究的重视, 并深化对汉语教材修辞表达策略的研究。

## 关键词

国际汉语教育, 话语体系, 汉语教材, 修辞策略

## 1 研究背景：中国话语构建与国际汉语教育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 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和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 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习近平, 2016)。“在国际传播领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让世界看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提高传播艺术, 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 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习近平, 2021)。简言之, “五种能力”“三贴近”“三表达”的最新表述, 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中国话语构建目标及方式的顶层设计。

整体来说, 中国话语的构建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和途径, 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也有各种各样

\* 通讯作者。联系电邮: [geng.zhi@sufe.edu.cn](mailto:geng.zhi@sufe.edu.cn)

的层次和途径,比如媒体报道、外交活动、体育和国际会议等大型活动、商业产品与品牌、双向旅游、留学与文化教育等。而文化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最为持久和深入,其中国际汉语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它既是中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文秋芳,2019)。国际汉语教育对中国话语的构建,也有别于政治外交、新闻媒体、商业活动、文化旅游等形式,它主要依托的是教材、教师和课堂内外的教学活动,融于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活动之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必然也学习与其交融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或改变其对中国的认知。可以说,国际汉语教育为中国形象的塑造,也为多元文化的理解与交融创造了语境。而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教材呈现何种话语直接影响着学习者形成何种中国认知。因此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为:当前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呈现出了何种话语面貌?应呈现出何种话语体系?以及又有哪些呈现策略。

## 2 研究综述:国际汉语教育的话语构建和教材的话语体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二语教学事业进入了全面大发展时期,学界对构建中国话语的自觉意识也日益凸显。“经历了4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外语学科已进入了重新出发、以我为主、创新驱动、自觉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的新阶段”(彭青龙,2017)。“40年来,汉语国际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内而外的发展历程也为国内外所瞩目”、“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和广大的从业者,是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处于汉语汉文化与不同话语体系接触和交互的最前沿,所具有的跨语言文化沟通和理解能力在促进中国话语表达和国家理解方面将发挥独特作用”(曹秀玲,2019)。

虽然这种构建中国话语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但整体上来看仍处于模仿学习国外的较低水平,“当前的中国语言学,至少其中很多的分支学科,尚未建构起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学界牵着鼻子”(陈新仁,2018)。“以西方语言为参照系的汉语语法体系也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白乐桑,2018)。“自20世纪初到现在,汉语及汉语教学存在的某些误区源于不承认、不承担汉语的特殊性”(白乐桑,2010)。除了探索从汉语汉字的特点出发进行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新路之外,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目前面临的一系列宏观问题,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汉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中国走向世界的汉语表达、“一带一路”建设对汉语教育提出的新任务、孔子学院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等,可以说国际中文教育新时代转向的诸多问题,都与中国话语的构建息息相关。

从根本上而言,包括汉语在内的二语教学都承担着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流的双重任务,面临着学习国外语言文化并通过外语向世界表达本族文化的使命。汉语学习者在来华留学及在海外学习汉语的同时,必然也学习与其交融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或更新其对中国的认知。“让外国人来讲好中国故事。这要比我们中国人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效果要好得多……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最有效的渠道与途径,就是通过各个国家的汉学家、中文翻译人员向他们国家的民众介绍中华文化”(陆俭明,2021)。因此,国际汉语教育除了着眼于提升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之外,还应考虑到广义上提升学习者理解和情感认同中国的能力。如胡范铸等(2014)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而“情感沟通”就是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的核心。换言之,国际汉语教育应有教授语言、传播文化、沟通情感的多重目标。这一点在汉语教学界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共识。

然而，学界对国际汉语教育对构建中国话语的意义的强调以及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现实，并未必然地带来了中国话语权和形象的提升。如盖洛普 2020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15 年左右持续降低<sup>1</sup>。孔子学院近几年的发展速度也有所下降，在一些国家甚至遭关闭或被多方审查和限制活动<sup>2</sup>。究其原因，除了中文教育等学术和文化活动被“政治化”<sup>3</sup>，同时也跟国际汉语教育在跨文化传播策略和话语修辞上的自身不足有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的教材在话语建构上的欠缺，比如东方文化里传统的教材式说教方式容易引起西方学生反感。一个典型例子是由瑞典汉学家林西莉提供的，其在《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 1961-1962》一书中回忆了她在北京学习汉语时的一篇课文：

（一位钢铁工人在一次生产事故中被严重烧伤）他被同志们送到医院，在昏迷之前他高喊：“我不想死，我想活！钢铁事业需要我！”但是按照医生的观点，已经无法挽回他的生命——实际上这些医生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接受的教育。医院的“领导同志”（党的书记）这时候召开会议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谁会被烧伤呢？当然是劳动人民。那里的医生怎么会救一个工人的命？但是我们可以！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挽回他的生命！”……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医生们挽救了这位伤者的生命。

林西莉称当时学习这篇课文时，课文里对共产主义国家医生的赞扬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医生的贬低曾经让其十分愤怒，因为“她自己的姐妹还有好几个其他家庭成员都是医生，他们在供职的医院里是尽心尽力地救死扶伤的，并没有因病人的具体工作而影响到医生的天职”。林西莉因为这篇课文与其授课教师和学校产生了冲突，并“感到与这个国家的距离在令人不安地增加”“这种政治性内容的课文越来越令人反感”。虽然这一篇课文随着时过境迁已被束之高阁，但现在这种在对比甚至在对立中表达自我的思维模式依然广泛存在。比如在新冠疫情的媒体报道中，“中国媒体在本次疫情报道中大多停留于数字增长、疫情发展层面，知识性、深度性、历史性等内容不足，关于他国成功经验或案例的深刻剖析以及借鉴价值方面的内容也不多”、“某些新兴媒体平台热衷于刊载或转发关于外国政府抗疫措施失当、外国民众不配合抗疫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国际新闻报道或评论不仅会误导受众，更容易滋生一种盲目自大的情绪”（李宇，2020）。简单地宣扬我国“生命至上”而“外国躺平”，并无助于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抗疫。

在“批判”外国中“赞扬”中国，这种话语模式不仅缺乏专业精神，更缺乏世界意识。从外国学生的角度看，这样的课文没有照顾到外国受众的文化和接受心理，自然让人感到抵触。如 2005 年出版的一本综合汉语教材，其中有篇课文选自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课文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变迁：

事实上，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具体表现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比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全球气温变暖、淡水资源匮乏、森林被过度砍伐、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动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频繁出现等等，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21 世纪应该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当然取代并不意味着消灭，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用东方“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也可以称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李泉（2011）讨论了这篇课文里的文化呈现方式和呈现心态，指出课文中诸如“西方文化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等内容不符合“不炫不贬”的文化选择和表述原则。我们也认为，尽管教材具有宏观话语构建或者具体话语激发的功能，但类似于这样的“褒贬分明”的课文进入国际汉语教材并不合适。如果遇到一些个性强的学生，课堂上不仅很难“跨文化”，反而可能造成“文化冲突”，“故意找茬”不仅没有起到“激发”学生说话表达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冒犯学生个体或者撕裂学生群体，影响到班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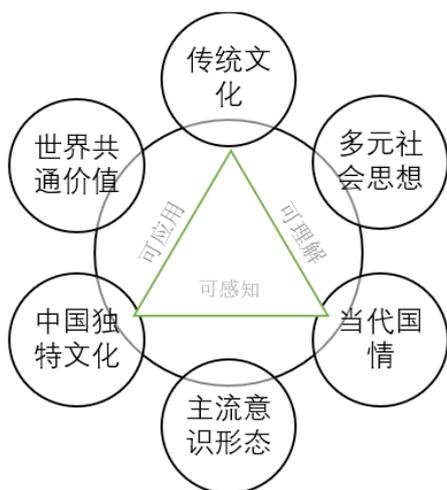
整体的学习气氛甚至整个教学项目的稳定健康发展。而这种在课本中“宣传民族精神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不但不能因此提高他们对中国的向心力,反而使他们觉得初级语言课本中夹带了政治宣传,这也是国内所出汉语课本容易受人诟病的地方”(周质平,2018)。因此,必须对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体系特别是修辞方面加以特别注意。在增强中国话语传播的主动意识的同时,避免造成跨文化传播中的冲突。做到善于介绍成就,敢于面对问题,公正而不中立,启发而不挑唆。这种意识进一步体现于实际研究和工作中,则需要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另外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则是具体的教材的修辞策略,这一点对汉语教师和教材编写者来说更为具体。

### 3 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修辞策略:理论与实例

如前所述,国际汉语教育的话语构建是一个宏大命题,其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汉语教材的话语表达,特别需要我们提升话语传播技巧,深化话语修辞研究。

从传播理论来看,任何讲述行为都包含三个主要参与者:公众主体、国家客体以及关于信息传播的媒介,而传播本身又是“自我”和“他者”、“言者”与“听者”等各个参与者之间互动的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哈贝马斯,2004)。一个高效的建构过程必须基于双方的共同参与,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双方超越表层的单向的展示,在深度的交流和平等的对话中实现不同视域的融合。而国际汉语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多方共同参与的直接讲述中国故事、并由受众理解中国故事的过程和平台。汉语学习者也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相融合的第三种“间性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非唯我性与非中心性特点,体现了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赵杨,2021)。因此中文教材的编者需要根据读者的特点,积极地重塑中国故事和教材话语,建构起内容上传统与当代共生、主流与多元共存、中国与世界共通,形式上具体可感知、文化上可理解、语言交际可应用的多维话语体系。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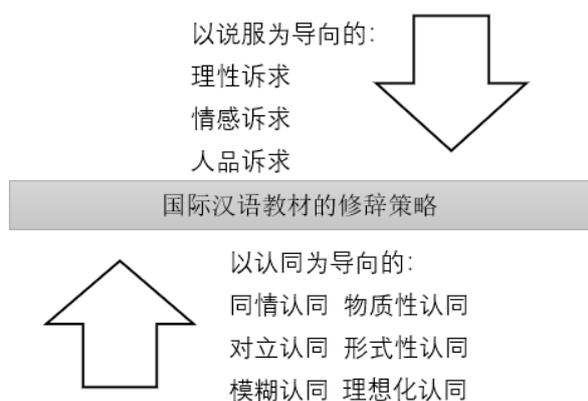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中文教材的多维话语体系示意图



从修辞学理论来看,言语就是以言做事,通过言语影响受众的一种行为,而修辞就是促进这一行为的手段。对于二语教材来说,话语修辞就是通过语言的文本和语言学习的过程,让学习者在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了解和接受目的语社会和文化,从而避免交际冲突。整体来说,当前的二语教材使用的修辞策略存在说服和认同两种取向。传统的二语教材更多的是表现为直

接的说服取向，当代二语教材更注重间接的认同取向。这两种倾向也可以从西方修辞学理论发展中得以解释。西方修辞学整体来说有两大流派，一是以“说服”概念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古典修辞学理论，二是以“同一”概念为核心的伯克新修辞学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就是“一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并进而提出“理性诉求”“情感诉求”“人品诉求”三种基本的说服方法（亚里士多德，1991）。简言之，即为说服对方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感之以德。肯尼思·伯克是当代西方修辞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享有“亚里士多德第二”的美誉（邓志勇，2008）。伯克将亚里士多德的“说服”理论发展为“同一”理论，认为修辞不只是一个“说服”对方的行为，一切用语言符号促成他人合作的行动都是修辞。伯克在演讲中具体解释了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我将归纳为旧修辞学的关键是词是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同一，其中包括部分无意识的因素”（伯克，1998）。换言之，伯克提出应该将“同一”而非“说服”确立为当代修辞学的中心概念，“同一概念有别于传统修辞学的规劝在于同一视交际双方为平等、合作的关系”（柴改英，2006）。伯克的修辞学理论强调修辞实践不只是维持言者与听者的竞争，更应促进言者与听者的合作，带有“修辞实践促进社会协同的道德期许”（刘亚猛，2008）。在话语策略上，伯克提出了三种获得他人认同的主要方式：“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模糊认同”。简言之，“同情”是突出言者与听者具有的共同情感，“对立”是突出言者与听者具有共同的对立面，“模糊”则是通过使用一些模糊性词汇如“我们”等使听者不自觉地产生与言者的身份等认同。伯克除了从认同的获得方式上区分了“同情认同”“对立认同”“模糊认同”外，还从认同本身的来源类型上区分了“物质性认同”“形式性认同”与“理想化认同”：人与人之间如果共同占有某种物质或者共同参与某事件或组织，如来自共同的家乡、做着共同的事业，则更易产生物质性或者形式性认同；如果共享某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如具有相同理想或者信仰，则更易产生理想化认同。这九种主要的修辞策略如下图2所示。

图2. 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修辞策略框架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一些有代表性汉语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不同类型的汉语第二语言教材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如上的三种诉求、六种认同等九种主要策略来作为其构建话语表达的技巧。下文是一些实例。

使用“诉求”策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语课本》（李德津主编，1977年，商务印书馆）。我们从其课文的选择中，能大致了解到话语修辞策略在当时教材中的体现。仅以表1所示的第二十二课文和二十六课为例。

表 1. 《汉语课本》部分课文

课文	修辞策略
第二十二课：五个孤儿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孩子们正在灿烂在阳光下成长。这里介绍的是五个孤儿的故事…… ……在吃人的旧社会，就连那些有父母的穷孩子都难养活，象（像）我们这样失去父母的孤儿，更没法活儿了。现在我能上大学，就因为有了毛主席，有了共产党……	情感诉求、 人品诉求
第二十六课：高师傅给我们上课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他们厂革命和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他还讲了自己的家史，讲了中国工人在旧社会受压迫，今天做了国家主人的情况……	理性诉求、 情感诉求

《汉语课本》作为一部早期的汉语教材，其编写时受到文革思想的严重影响，无疑在意识形态上太过偏颇，而且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割裂的态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传统文化开始复兴，中国也向世界打开了开放的大门，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了热点。这也反映到了汉语教材的话题变迁上，经济话题代替了政治话题。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以及面向国际的视野，这些都使得汉语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展现出新的面貌。这种变化，体现出当代汉语教材的话语表达，已经从显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向了隐性的文化传播。尽管教材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目标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修辞技巧有了很大的改变，整体上从以简单直接的说服目标取向转向了以取得认同为目标取向。这点也可以在近期新出版的一些汉语教材中找到佐证。如下表 2 分析了《博雅汉语》飞翔 3（李晓琪主编，2004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部汉语教材的一些修辞策略。

表 2. 《博雅汉语》（飞翔 3）的部分课文以及修辞技巧

课文	修辞策略
第三课：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意义 阅读理解：积极面对中国发展：它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	同情认同、物质性认同
第四课：保护城市生态刻不容缓 阅读理解：人类要把其他生命当作朋友	对立认同、形式性认同
第五课：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阅读理解：文化叫做什么？	模糊认同、理想化认同

话语修辞策略除了体现在课文主题和视角的选择以外，还体现在具体的课文语言表述上。比如笔者曾参加国家汉办规划教材《当代中文》的修订工作。该教材于 2003 年初版，考虑到该教材的“当代性”，于 2016 年又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保留了原教材的基本主题和语言点，但对课文的一些语言表述进行了修订。如第三册的第六课是在加拿大留学的林娜写给国内的“一封家书”，其中对比了中加生活和文化差异。下表 3 展现了我们的一些具体修订点和修订策略，从中读者也可以体会到笔者作为教材编者时所进行的考量。

表 3. 《当代中文》课文修订示例

原课文	修订版课文	修订原因及策略
<p>标题：一封家信</p> <p>（电话费太贵了，电子邮件又说不清楚，因为我这儿的电脑还没装上中文软件，只好给你写信。）</p> <p>平平：你好！</p>	<p>标题：一封电邮</p> <p>平平姐：久未联系，你一切都好吧！</p>	<p>从手信改到电邮，突显网络时代特色。在社交方式上体现物质性认同。</p> <p>增加称呼语和问候语，使之语用更恰当，也突显中国的人情文化。在人际关系层面体现同情认同。</p>
<p>全加拿大总共只有三千多万</p> <p>人，大概是中国的四十分之一。</p>	<p>全加拿大总共只有三千多万人</p> <p>口，大概是中国的四十分之一，</p> <p>只比上海市人口多一点儿，其</p> <p>中大约有百分之三是华裔。</p>	<p>增加关于中国的信息含量，在</p> <p>比较中突显中加人口差异对</p> <p>比，并激发海外华人身份的形式</p> <p>性认同。</p>
<p>（商店）顾客那么少，他们能</p> <p>赚钱吗？</p>	<p>（商店）顾客那么少，他们能</p> <p>赚钱吗？还有他们的商店下午</p> <p>早早儿就关门了，周末也不开</p> <p>门。这让我有点儿不适应。</p>	<p>增加关于加拿大的信息含量，</p> <p>提供更多的生活信息和个人心</p> <p>理感受。增加受众的同情认同。</p>
<p>他们都很有耐心，几乎对每一</p> <p>个乘客都要说“早上好”，我</p> <p>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职业习</p> <p>惯。如果他们在北京、上海开</p> <p>公共汽车，还会有这么好的</p> <p>耐心呢？</p>	<p>他们很有耐心，几乎对每个乘</p> <p>客都要说“早上好”，我不知</p> <p>道这是不是他们的职业习惯。</p> <p>北京、上海的司机就怎么没这</p> <p>么好的耐心呢？不过如果他们</p> <p>也在北京、上海开车的话，每</p> <p>天面对人山人海的乘客，还要</p> <p>时刻小心看路，我怀疑他们还</p> <p>会不会那么有耐心。</p>	<p>为中加司机习俗差异的背后原</p> <p>因提供一种可能的解读，避免</p> <p>文化对比的简单化、片面化。</p> <p>化解对立认同，强调模糊认同。</p>
<p>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p>	<p>想念你。保持联系！</p> <p>祝身体健康，一切顺利。</p>	<p>增加结语，更新祝福语。使之</p> <p>更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表达</p> <p>习惯。增加同情认同和理想化</p> <p>认同。</p>

作为一套近年来中美合作出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主持编写的国际汉语教材《环球汉语》也呈现出一系列的认同修辞策略，这种策略的应用不仅体现在课文部分，还有可能体现在练习部分。如，下表 4 是《环球汉语》第三册（任友梅等主编，2018，华语教学出版社 / 耶鲁大学出版社）在“读与写”练习中的一些具体体现。

表 4. 《环球汉语》练习中的修辞示例

练习(句子朗读题)	修辞策略
<p>第十四单元: 味美价廉(出门吃饭)</p> <p>很多中国人觉得, 人生的滋味跟中国菜一样——酸甜苦辣都有。有时候吃的东西会很甜, 有时候会很苦。人生也是这样, 也有不同的滋味。我们高兴的时候, 觉得生活很甜; 不高兴的时候, 觉得生活很苦。你说, 你是跟菜一样吗?</p>	<p>模糊认同(用“很多中国人觉得”来表达一种共同的中国文化观念; 用“人生的滋味跟中国菜一样”这种比喻方式来传达一种似是而非、难以言说的复杂理念; 用“你说, 你是跟菜一样吗?”来模糊“说者”与“听者”身份的不同, 从而使学生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产生对“人生的滋味就像中国菜”的认同。)</p>
<p>第十九课: 海阔天空(计划出行)</p> <p>北京一年有四个季节: ……。澳大利亚的悉尼也是一年四季, 可是那儿的季节跟北京相反: 北京的夏天是悉尼的冬天, ……。悉尼的人夏天觉得天气太热太热的时候, 也可以去北京凉快凉快。那, 什么地方天气最好? 有人说夏威夷最好: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夏威夷的夏天还不热, 舒服极了。</p>	<p>对立认同(通过对比北京和悉尼的天气, 指出悉尼夏天的时候没有北京的天气舒服, 又通过跟夏威夷的天气对比, 指出美国夏威夷的气候最舒服, 从而建立对北京和夏威夷天气的认同。)</p>
<p>第二十课: 活到老学到老(中文学习)</p> <p>有两位中文老师在谈论中文教学。唐老师说学生们觉得学中文的声调很难……还有呢, 汉字也非常地难学。因为每一个字都不同, 所以要学很多很多字。不像西方语言只要学会不到三十个字母就可以拼出很多字了, 比学中文汉字简单得多另一位老师说, 她认为中文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中文的四声在其他语言里也有, 只不过不叫“声调”……中文的读和写可以慢慢地学, 因为人们要是能活到老就要学到老。李雅图是个高中生……中国的学生跟外国学生一样, 都得非常用功学习才会有好成绩。</p>	<p>同情认同(很多“学生们”都觉得中文声调和很难。)</p> <p>对立认同(用中文和西方语言对比, 指出中文跟西方语言有异也有同, 只不过具体叫法有所差异。)</p> <p>模糊认同(“人们”要是能活到老就要学到老; 中国的学生李雅图也认为中国学生跟外国学生一样, 都要非常努力学习才能有好成绩。)</p>

#### 4 国际汉语教育和教材话语体系研究展望

前文以国际汉语教育在中国话语构建中的独特作用为切入点, 简要回顾了当前国际汉语教育及国际汉语教材在话语体系建构上的得失, 讨论了国际汉语教材在话语构建中要处理好传统与当代、主流与多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并结合二语教学的实践性、跨文化性、交际性等原则, 提出了一种内容上共生、共存、共通, 形式上可感知、可理解、可应用的汉语教材话语体系多维模型。同时, 结合当代修辞学的发展, 以具体教材的话语修辞为案例, 总结和阐释了汉

语教材话语修辞的九种基本策略。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和教材的话语体系这一新问题，笔者也是提出一些初步思考，我们认为当前有两个方面亟待研究。

一是如何提升国际汉语教育话语体系和表达模式的针对性。国际汉语教育不同于单纯的外宣工作，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学科，国际汉语教育中对中国话语的构建也要根据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特点和规律，采用不同的内容体系和表达模式。诸多经验告诉我们，单向度的宣传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上了一学期中国文化课之后反而对中国文化充满偏见的学生也大有人在。当代建构主义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是一个学习者对信息的主动加工、过滤和重新建构的过程。这启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受众，有选择地调整内容侧重点，与其关切同频共振，方能更好入耳入心。“把握话语权的特征及构建技巧，遏住问题要害，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动态把握话语权的独特性和通融性、民族性与世界性”（韩海涛、赵萌琪，2017）。

“国际汉语教育要根据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特点和规律，采用不同的内容体系和表达模式”（耿直，2018）。从这个角度讲，提升我们国际汉语教育话语表达的针对性，不是“存大同求小异”而是“存小异求大同”，不是刻意地去夸大和宣传中国文化的独特内容，而是要深入发掘中国优秀文化与世界共通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凸显中国文化的全球意义，从文化输出心态转为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发展。而这也要求我们中国语言及文化的教学处理好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根据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的不同，做好中国话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比如教材里不仅要宣传太极拳、儒家思想等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更要介绍全球华人的节日民俗、生活方式等文化习俗，还要讨论西方人普遍关心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等当代中国国情，让不同地域和类型的汉语学习者都能学有所乐、学有所获，真正体现国际汉语教学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也是世界的事业。

二是如何更为系统、细致地总结和丰富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修辞策略。汉语教学界当前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汉语学习应该聚焦于汉语本身，教材也应该以教会学生汉语的语言结构形式为主要目标。但我们认为，形式和内容不是对立的，也不应人为地割裂开来。如果说语言知识是教材的骨骼框架，那么通过语言学到的知识就是教材的灵魂，学生应该在学习语言形式的同时，认识、了解和理解该语言使用者的精神思想和目的语社会的文化和现实。之所以学界存在这种比较片面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认为，汉语教材中所体现的知识体系不仅仅只是语言知识或者语言学知识，除了这两者，起码还应有与语言学习相关的知识（如习得策略、交际策略等）、通过语言学习到的知识（如文化内容、价值观念等）。这就需要我们更新理念，加强汉语教材的相关理论研究，“教材的建设者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理论功底，更要有高站位、具备国际化事业和融通中外的意识和能力”（郭风岚，2021）。另一方面，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汉语教材编者在深入进行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应重视语言修辞策略技巧的学习，丰富和提升教材的话语修辞技巧。如在宏观主题上，研究如何通过教材和教学中设置话题议程，引导讨论走向。研究如何创新表达方式，用学生熟悉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用恰当的技巧和形式表达中国观点，形成“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在微观语言上，研究在文本中如何表达个人意见与设计评论性词句，研究如何将抽象的价值观和思想符号化、具象化，研究如何使用开放的文本和多义性话语来允许学生从多个文化角度进行多种理解和辩论。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上，要研究如何让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感性体验相结合，多维度地了解、思考中国，从而形成丰富、积极和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形象。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国际汉语教材研究和实践面临的新课题。

总之，本文初步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的话语体系建设与汉语教材的修辞策略问题。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教材研究和编写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将两者结合起来

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命题。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够丰富,也尚无成熟的研究范式,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限于篇幅,文章也仅以教材为例,对其话语体系框架进行探讨,对其话语修辞策略举出例证,求教于方家。期待能够引起更多的国际同行专家们的兴趣,共同开拓国际汉语教育和教材建设的新局面。

## 致谢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国家一般课题“新时代国际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与价值导向研究”(BGA210059)资助。

## 注释

1. 盖洛普民调: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恶感达历史高度。[https://zhuanlan.zhihu.com/p/262488346?utm\\_source=wechat\\_session&ivk\\_sa=1024320](https://zhuanlan.zhihu.com/p/262488346?utm_source=wechat_session&ivk_sa=1024320)
2. 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面临审查签订新的校际合作协议。<https://www.sydney.edu.au/confucius-institute/about-us/our-partners.html>
3. 中国驻德国使馆发言人应询就在德孔院取消有关活动表明立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488561464795785&wfr=spider&for=pc>

## 参考文献

- 白乐桑(2018)汉语教学的根本选择,《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4),12-21。
- 白乐桑(2010)承认汉语的特殊性—语言测试对汉语教学的考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8(4)。
- 伯克[美](1998)《当代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曹秀玲(2019)汉语国际教育知识体系的特色与构建—提升原创力 推出精品作 构建新话语 扩大影响力,《世界汉语教学》,33(2),154-155。
- 柴如瑾等(2019)国际中文教育,从热起来到实起来,《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0日07版。
- 柴改英(2006)《广告语篇的“同一”修辞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 陈新仁(2018)试论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外语教学》,39(05),14-18。
- 邓志勇(2008)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述评,《修辞学习》,6:15-23。
- 福柯(2017)《福柯说权力与话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耿直(2018)论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构建—以国际汉语教育为视角,《学术前沿》,(03),100-103。
- 郭风岚(2021)论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理念,《国际汉语教学研究》,31(3),46-52。
- 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 韩海涛、赵萌琪(2017)动态把握话语权建设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学术前沿》,(15),78-81。
- 胡范铸、刘毓民、胡玉华(2014)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新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46(2),

145-150。

李泉（2011）文化内容呈现方式与呈现心态，《世界汉语教学》，25（3），388-399。

李宇（2020）报道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要有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中国记者》，557（5），70-72。

林西莉（2016）《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 1961-1962》，中华书局。

刘亚猛（2008）《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陆俭明（2021）为确保当代中文走向世界必须做好的四件事，在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1）上的发言，商务印书馆公众号 2021 年 10 月 20 日报道。

彭青龙（2017）再出发：自觉构建中国外语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外语教育》，10(1)，8-14。

文秋芳（2019）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 70 年的建设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0(5):57-67。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2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2 日第 1 版。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罗念生译，《修辞学》，三联书店。

赵杨（2021）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主体间性研究——兼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自我”与“他者”，《民族教育研究》，32（05），170-176。

周质平（2018）汉语教学的理念、内容与方法之我见，《国际汉语教育》，18（2），8-14。

投稿：2021 年 10 月 31 日；接受：2021 年 12 月 18 日；出版：2022 年 6 月 15 日

## 作者简介

耿直，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教学语法及教材编写，发表中英文论文 30 余篇。

高源，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21 级研究生。

#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hetoric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Zhi Ge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Yuan Ga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CE) is a significant way for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 storytelling, and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world's diverse cultures.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is also facing new dilemma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improper. Taking several ICE textbooks as examples, echoing the national's top-level design of "three closeness", "three expressions" and "five competenc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inappropriat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the textbooks, draws on contemporary rhetoric theor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ree intercommunity and three applicableness" discourse system of ICE textbooks, as well as a "three demands, six identification, nine rhetoric strategies" of ICE textbook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mot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ICE textbooks.

##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rhetoric strategies

*Dr. Zhi Ge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is research area is Chinese teaching grammar and textbook.

*Yuan Gao*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